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阶*

于运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特质与“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初步建构起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叙事体系。该体系初步具备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特质,以及理念宣示、政策宣介和舆论斗争的国际传播功能,对于破除西方媒体制造的虚假、扭曲、片面的民族刻板印象,树立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形象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体系正在迎来时代性、超越性的范式转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进阶,就是要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斗争实践基础上,以破立并举的勇气加快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积极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知,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多元一体 融通中外 对外话语与叙事体系 国际传播

作者于运全,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高级编辑。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邮编100000。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和艰辛的奋斗历程。56个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中孕育生长、成熟壮大,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①特别是在近代以来百年救亡图存的英勇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命运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建立起具有共同政治信仰与民族梦想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进入21世纪,全球化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深入普及,既为跨国信息流通、文明交流、政治交往带来了巨大便利,也为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的蔓延提供了土壤。特别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及其媒体以“民族国家”“民族自决”“民主人权”等话语为工具,散布“泛突厥主义”“大藏区”“泛蒙古主义”等极端分裂思想,试图歪曲和解构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对我国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ZDA126)、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1&ZD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①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②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对国际舆论形势复杂变化、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如何在国际传播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破除西方制造的负面民族形象,在民族问题上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舆论主导权,是新时代国际传播研究和民族研究的共同课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及其形态既来源于社会历史实践,又有其相对独立性,遵循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认知规律。^③传播学叙事理论认为,话语与叙事是建构共同体认知的关键单元,反映和形塑着特定的共同体意识。中西方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舆论斗争,直接表现为民族话语与叙事之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是破解本课题的重要指引。

鉴于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路,就是基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以破立并举的勇气推进理论与知识创新,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体系,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形象认知,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与共有精神家园。沿此路径,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原理及传播学叙事理论,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形成过程,提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方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话语与叙事体系,并对两者关系进行关联对比分析,进而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考和启示。

一、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理论

(一)意识形态:基于客观实践的“相对独立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创制了“意识形态”的德语概念,并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进行哲学思考,阐释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经济状况决定该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般原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充分认识到,这种影响是复杂的、间接的、不明显的,不能简单机械地解释这种决定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在这里

①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②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中国民族报》2022年3月8日。

③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译:《哲学与政治》,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

④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⑤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①“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②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意识形态及其诸形式除了受到社会实践条件及经济基础制约之外,还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这样阐释,“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③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阐述,这种“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发展变化的不完全同步性,意识形态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意识形态诸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④ 恩格斯承认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强调这种独立性根本上讲还是来源于客观实践。“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⑤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性和相对独立性有原则性的阐述,但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意识形态及其诸形式的本质、特征及“特殊规律”。正如后继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所说:“在认识论、科学史、意识形态史、哲学史、艺术史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大部分还有待开创。”^⑥ 正因如此,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中,从两个方面提出意识形态具有独特的认知功能:一方面,“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即意识形态无论是同实在界还是观念界的关系,都是通过意识形态具有想象性的认知功能而得以呈现;^⑦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存在于国家机器及其各种实践之中,意识形态的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⑧ 所以意识形态相应地就具备了“物质实践性”。从这两点出发,意识及其诸形式就是基于客观实践而产生的认知,但“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⑨

(二) 话语叙事:反映和建构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

传播学叙事理论的两个核心命题,“一是故事,也就是说什么人遇到什么事;二是话语,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是怎样被人讲出来的”。^⑩ 所谓“话语”,简言之,就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概念、范畴、表述,背后是思想,实质是“说理”。“话语是社会、历史及制度化行构的产物,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产生的”。^⑪ “叙事”,就是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3页。

②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50页。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61页。

④ 冯春明:《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及其相对独立性》,《江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⑥ [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2页。

⑦ 陈飞:《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功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⑧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译:《哲学与政治》,第29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1页。

⑩ 李琦:《叙事话语与意识形态——对女性媒介传播策略的解读》,《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⑪ [美]约翰·费斯克著、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等要素构成的故事、情节、叙述,背后是事件,实质是“说事”。话语与叙事的关系,就是讲道理与讲故事之间关系,两者实为人类沟通交流形成认知的两种方式,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①

话语叙事是反映和建构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两者关系密切。一方面,意识形态决定了话语与叙事的生产。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知识考古学》中指出,“近代以来各种看似纯然客观的知识或话语,实际上都与各种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具有勾连繁复的共生与互动关系,实际上就是各种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纵横捭阖的言说过程及其产物”,^②即意识形态的产物。另一方面,话语叙事反作用于意识形态的构建。“说什么”“怎么说”“以什么身份说”,即话语内容、形式、倾向及叙事方式孕育着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关系再现则成为意识形态。^③话语与叙事能够不断通过人民耳熟能详的方式巩固意识形态,掩盖社会关系的对立。^④简言之,“意识形态控制着话语叙事,而话语叙事也帮助建构了意识形态”。^⑤

具体而言,话语与叙事正是通过建构共同体认知而反映和形塑意识形态。如果说叙事能够阐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结果等主要事实认知元素,那么话语则旨在揭示认知背后的道理、逻辑和价值。两者共同建构出真实、立体、丰满的认知图景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表征。由此出发,话语叙事对于建构共同体认知、形塑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国内学者对此已有初步的研究。如王建平在其所著《帝国与文学生产——美国文学中的帝国想象与民族叙事》中,就深刻揭露了美国文学中的民族话语叙事所建构的帝国想象认知与帝国主义民族意识形态之间的交织与互动关系。美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同时也是民族话语叙事与帝国意识形态交互发展的历史,民族话语叙事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张力在美国人特有的疆土意识、民主理念和身份认知之中都有体现。^⑥

综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阐释了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源于实践的一般规律,又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独特认知功能。传播学叙事理论又揭示出话语叙事在建构共同体认知、形塑共同体意识中的关键作用。鉴于此,“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源于民族形成发展的客观历史实践,也由此衍生出特定的民族认知,其内在机制就是特定群体在交流交往的传播实践中实现了民族话语与叙事的建构与共享。因而,通过研究民族话语与叙事,就能够揭示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图景,呈现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与现实挑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伟大斗争中产

①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②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页。

③ 肖小穗:《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④ 辛斌:《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现代外语》1996年第1期。

⑤ 成方舟:《叙事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基于〈新闻调查〉叙事视角的分析》,《青年记者》2012年第26期。

⑥ 高永刚、甘露:《美国文学中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的互动与张力——评〈帝国与文学生产——美国文学中的帝国想象与民族叙事〉》,《大学教育科学》2017年第5期。

生的。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存在了几千年,但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觉醒的。^① 黄兴涛也认为,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就是20世纪初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生成之后,特别是清王朝临近崩溃之际和最终覆亡之后,在中国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符号意义的民族观念凝结物”。^② 而这个“民族观念凝结物”的形成,也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逐步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结果。梁启超首提“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全中国各族群应“摒弃成见、团结起来”,才能“振兴中国、保全种族”。^③ 陈独秀、孙中山等进一步明晰了“中华民族”所包含的范畴,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广泛论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一体性”。李大钊就认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也”,^④ 费孝通则根据中国自古以来“多民族、大一统”的实际提出“多元一体”论。中国学者逐步提出从“单一民族国家”转移到“五族共和”再发展到“多民族国家”的构想。^⑤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打出“全民族抗战”的话语旗帜,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为其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灵魂。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报刊、广播以及民主进步媒体传播的民族话语与叙事,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努力争取全民族团结抗战,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边区群众报》等红色报刊为主体,以《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时论丛刊》《祖国呼声》等民主进步报刊为辅助,“通过传播中华民族概念、记录民族苦难、强化领土主权意识、宣传爱国主义思想、重拾民族历史记忆等方式,建构中华民族认知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建构”。^⑥ 特别是针对蒋介石集团及其媒体抛出中华民族“一元论”和“宗族论”,鼓吹“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⑦ 中国共产党红色报刊直接揭露其“大汉族主义”的本质,建构了“多元一体”“民主联合”“民族大团结”等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如《解放日报》刊载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应和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进行平等的民主的联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⑧

围绕“中华民族”不同的话语与叙事方式能够建构出不同的共同体认知,也必然产生截然不同的政治愿景与主权意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鼓吹的所谓“中华民族‘一元论’或‘宗族论’”源于西方“单一民族”论,要么把少数民族排除在外,要么贬低少数民族地位,实际上服务于大资本集团利益和投降、分裂、倒退的抗战政策;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③ 梁启超:《致伍秩庸星使书》,《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④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⑤ 李亚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渊源及发展脉络初探》,《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⑥ 参见凌富亚、蒲佳丽:《全面抗战时期红色报刊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李琼、凌富亚:《抗战时期〈解放日报〉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传媒》2021年第24期;凌富亚、蒲佳丽:《抗战时期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中国编辑》2022年第1期。

⑦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中央训练团印行,1943年。

⑧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

不仅符合中国民族实际状况,有利于联合各个民族,而且赋予每个民族平等地位,服务于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抗战、团结、进步的政策基石。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报刊、广播等大众媒体跨越时空地域的大范围传播,把广袤疆域内的各民族以相同的话语叙事连接起来,就赋予了各民族共同的身份认知,使他们相信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由此催生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救亡伟大斗争实践的中流砥柱,也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流砥柱。

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特别是随着数字新媒体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媒体、多语言的内容产品加速迭代,跨国界、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日益扩大,即时化、互动化的传输效率不断提高,传播形态、传播范围与传播速率均大大超越了印刷媒体时代。任何传播主体都可以在任何地点建构民族话语与叙事,跨越国家与文化界限向每一个孤立的个体即时传播,进而产生大范围建构或解构共同体认知的效果。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指出,电子媒体集体性、共时性、全球性的传播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活动的大众参与形式,“它能够将大众转变成一国人民,将一国人民转变成一个民族”。^①特别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蔓延,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思潮的局部复苏,西方媒体试图通过炒作涉藏、涉疆、涉蒙等民族议题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牵制中华民族复兴进程。

对此,国内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例如,孟慧丽对2008年拉萨“3·14”事件以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涉藏报道进行研究,双方在议题设置、话语建构与叙事方式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话语斗争。^②严怡宁通过对美国《纽约时报》2000年至2011年有关中华民族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西方媒体报道多采用“破坏性媒介事件”框架迎合分裂分子诉求。^③郭继荣、王馨苑对2013—2021年《纽约时报》与《中国日报》关于民族议题的报道分析认为,西方媒体倾向于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定性为“民族压迫问题”,建构负面的中国共产党及国家形象。^④总体来看,学界围绕“中华民族”的国际传播研究仍较为匮乏,且大多聚焦于中西方媒体的报道框架与策略分析,而对于双方话语与叙事所建构的共同体认知及共同体意识则缺乏深入研究。

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成为国际传播工作与民族工作的重大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⑤鉴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原理及传播学叙事理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

①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② 孟慧丽:《话语权博弈:中国事件的外媒报道与中国媒体应对》,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③ 严怡宁:《媒介事件化的中国民族问题——对〈纽约时报〉2000年以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研究》,《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④ 郭继荣、王馨苑:《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话语建构——以〈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为例》,《情报杂志》2021年第12期。

⑤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际传播新思路,就是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话语与叙事体系建设,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体认知,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与共有精神家园。

三、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话语与叙事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就民族工作做出系列重要论述,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叙事体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本文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相关系列讲话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发布的白皮书进行文本分析发现,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涵盖民族历史、民族关系、民族文化、民族权利、民族梦想、民族风险隐患等诸多方面,基本构建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认知结构与意识图景。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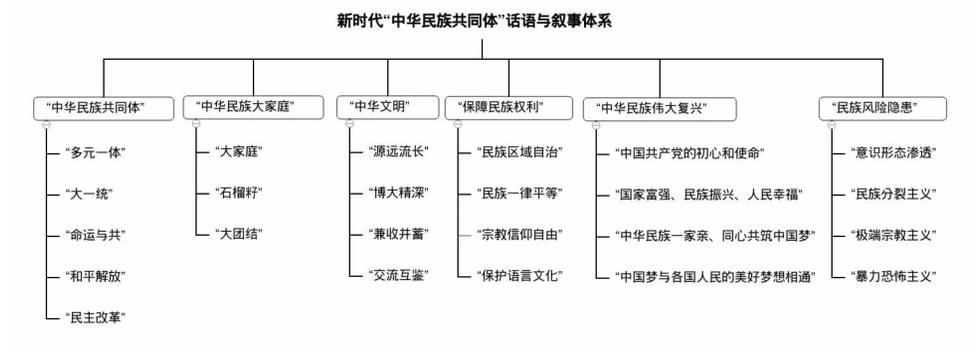


图 1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示意图

核心话语一：“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概念,对“中华民族”定性为“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解释了中华民族以“民族共同体”建国与西方国家“单一民族”建国的根本不同。这一话语主要包括四大叙事:一是“多元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①这一叙事着重论述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的广袤疆域、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及伟大精神,在文化兼容、经济依存、情感亲近中走向团结统一,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二是“大一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也是“多元一体”的“一体”的体现。这一叙事阐述了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大一统”理念和多民族国家格局,以及 5000 多年文明发展史上各民族在不断诞育、分化、交融中始终维系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三是“命运与共”。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述,“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②这一叙事突出强调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的百年抗争,推动实现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四是“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两者紧密联系、实为一体,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巨大贡献,也是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标志性话语。习近平总书记

① ②《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

曾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会上说：“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在旧西藏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的百万农奴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依法拥有并享受着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利，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民主改革和成立自治区，西藏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①这一叙事是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主义大家庭属性的关键。总之，“多元一体”“大一统”“命运与共”以及“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成逻辑。

核心话语二：“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国共产党使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概念，阐述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这一话语由三个主要叙事组成：一是“大家庭”。中国共产党这样阐释这一“大家庭”关系，“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间的关系……各民族是骨肉兄弟，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②这一叙事说明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骨肉相连、水乳交融的关系形态。二是“石榴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③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石榴籽”的比喻恰当地阐述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三是“大团结”。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中，中国共产党特别着重强调“中华民族大团结”，将其视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坚决“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④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核心叙事。“大家庭”“大团结”“石榴籽”三大叙事，共同建构起“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逻辑。

核心话语三：“中华文明”

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话语，“中华文明”集中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与思想结晶。这一话语的主体叙事包括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⑤这一论述阐释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各民族文化在交相辉映、互鉴融通中不断发展升华、应时处变，形成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二是“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⑥这一叙事阐述了中华文明思想的多元与深刻。三是“兼收并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⑦“兼收并蓄”叙述的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深层动因。四是“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

① 习近平：《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0日。

②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③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⑤ 《牢记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人民日报》2019年7月17日。

⑥ 《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

⑦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

指出,“中华文明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① 这一叙事涵盖历史上“丝绸之路”“佛教东传”“伊儒会通”,以及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等诸多故事,呈现着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宏大气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兼收并蓄”“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话语的主要叙事支撑。

核心话语四:“保障民族权利”

“保障民族权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根本利益的核心话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话语体系包括四个主要叙事:一是“民族区域自治”。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是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新办法,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② 二是“民族一律平等”。这一叙事阐述了中华民族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各民族公民平等享有自由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平等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三是“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每个民族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某一种宗教的自由,也有在同一宗教中信仰某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③ 四是“保护语言文化”。其主要内涵是,中国切实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益,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地区文化繁荣发展,并依法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行政管理、司法活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合法使用。^④ 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在“保障民族权利”方面有全面的论述与叙事。

核心话语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中关于民族历史使命与未来愿景的话语建构。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⑤关于“中国梦”的话语与叙事体系就逐步建构起来。这一话语衍生出四大叙事体系: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⑦ 这一叙事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叙事阐述了“中国梦”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本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⑧“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⑨ 三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阐释,其主体叙

①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②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2018年4月4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

⑤ ⑨《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

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⑧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5月4日。

事是“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的梦”,“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①四是“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这一叙事重点围绕“中国梦”的全球意义展开,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②不是“扩张梦”“霸权梦”“零和博弈”。主体论述包括中华民族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界理想,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文化理念,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交往原则,以及维护世界和平、造福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望。

核心话语六:“民族风险隐患”

这一话语指代的是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种风险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此有一段精炼的阐述:“要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要守好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等工作。”^③这一话语论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叙事:一是“意识形态渗透”。在民族问题上,就是指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色政治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侵蚀和颠覆。二是“民族分裂主义”。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大藏区”“泛蒙古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境外反华势力与国内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势力结合策动所谓“民族独立”的分裂祖国行径。三是“宗教极端主义”。这一叙事阐述的是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势力从原教旨主义出发,企图恢复“神权统治”、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极端政治行为。四是“暴力恐怖主义”,意指宗教反动势力打着“圣战”的宗教幌子,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胁迫国家机关,以实现其民族独立、政权颠覆的行为。这四个方向往往相互交织,叙述的是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与政治认同的主要隐患因素。

以上六个核心话语共同组成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话语及叙事体系,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培育的共同体意识拥有“大家庭”般的民族关系、悠久灿烂的文明传统、依法保障的民族权利、伟大复兴的民族梦想和需要防范的民族风险隐患,其有两大基本理论作为支撑:

第一,符合中华民族实际的“多元一体”民族理论。以费孝通为代表,这一理论承认中国境内数千年来多民族并存发展的现状,主张维护中华民族多民族并存的局面,以共同认可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制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④这一理论既有“多元”也有“一体”。“多元”意指中华民族由“多个”民族组成,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各民族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存在差异;“一体”指各民族在漫长的民族交融历史、艰苦的民族救亡战争以及光荣的民族复兴征程中,逐步形成的统一的共同体。“多元一体”是从中国几千年来多民族、大一统的独特国情提炼而来的民族理论,是中华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我们所怕的,不是各民族的独立自由之发展,而是不能在同一历史任务之下,

①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日。

② 习近平:《中巴人民友谊万岁》,《人民日报》2015年4月20日。

③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④ 俞祖华、耿茂华:《单一国族·一元一体·多元一体: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三种类型》,《东岳论丛》2018年第1期。

统一团结起来。……只有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与自由发展的权利,在民族与民族间建立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以兄弟的友谊相互团结,则‘自杀的惨剧’自然可以消灭,真实的民族大团结也才能实现”。^①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中提出“允许蒙、回、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 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建立起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基石、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以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为归宿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③ 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就是凝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灵魂。

四、西方媒体建构的主要的中华民族话语及叙事

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西舆论斗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媒体利用其话语霸权,炒作涉藏、涉疆、涉蒙等民族议题,试图在国际社会营造截然不同的“共同体现象”,歪曲和消解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本文对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卫报》《环球邮报》《时代周刊》《印度斯坦报》等20家西方主要媒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涉“中华民族”的218篇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西方媒体从民族历史、民族关系、民族制度、民族治理、民族未来等方面,建构起一整套围绕“中华民族”的负面话语与叙事。其主要话语与叙事如图2所示。



图2 西方媒体关于“中华民族”的话语与叙事体系

负面话语一：“侵略殖民”(Colonial Invade)

在民族历史上,西方媒体将新疆、西藏、内蒙古等民族地区纳入中国版图视为“中国对周边民族的武装入侵”,将解放军视为“侵略者”,将汉族在边疆地区的治理视为“殖民扩张”。如英国《卫报》2021年8月20日报道称,“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vaded Tibet”(中国人民解放军侵略西藏),“crackdown on border regions home to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Tibet”(打击西藏等作为少数民族家乡的周边地区)。美联社同日报道称,“Tibet was effectively

①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苏杂志》1940年第1期。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③ 吴自聪:《社会主义民族观》,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

independent for most of its history”(西藏在其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实际上都是独立状态)。印度《印度斯坦报》则质疑中国国界:“With the passing of old Soviet—era apparatchiks in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bordering Xinjiang and the growth of fundamentalist Islamist forces, the new leaders are likely to have less incentive in keeping the borders with Xinjiang sealed”(随着中亚五国苏维埃时代的过去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兴起,新一代中亚国家领导人对于维持与新疆的国界线的意愿越来越低)。

负面话语二:“强制同化”(Forced Assimilation)

西方媒体将我国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以及平等、和谐、互助、团结的民族关系描述为“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强制同化”。如英国《卫报》在2021年8月20日的报道中称,“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of assimil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including Tibet,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where punitive measures have sought to reduce the presence of loc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中国政府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实施同化政策,并采取严厉措施打压本地语言和文化)。美国《纽约时报》2014年5月31日的报道称,“Uighurs, a Turkic—speaking people who mostly practice a moderate form of Sunni Islam”(维吾尔族是以突厥语为母语、大多数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义的人民),“the Chinese leader has called for better assimilating Uighurs into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moving more Uighurs from Xinjiang to other parts of China, where they can live among the Han, the nation’s dominant ethnic group”(中国领导人要求更好推动维吾尔族融入中国社会,包括将维吾尔族人移民到中国其他地区,使其与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汉族一起生活)。

负面话语三:“专制压迫”(Totalitarian Repression)

西方媒体以“民主—专制”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框架阐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将其歪曲为“专制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残酷政治压迫”,反复重复的叙事包括“共产主义专制”“挤压自治权”“全面社会监控”“压迫宗教团体”“打击异见分子”“政治思想教育”等。如美国《华盛顿邮报》2021年7月6日报道称,中国共产党“crushing of the Uyghurs and Hong Kong’s autonomy”(正在挤压新疆维吾尔族和香港的自治权),“dictatorial rule will present an escalating threat to the democratic world”(专制统治将给民主世界带来更大威胁)。美联社2021年11月11日报道称,“The party has tightened control over society, suppressing independent religious groups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s”(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压迫独立宗教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18年10月7日报道甚至称“communism doesn’t like religion”(共产主义不喜欢宗教)。

负面话语四:“侵犯人权”(Human Rights Abuses)

“侵犯人权”是西方媒体在报道新疆教培中心等具体民族治理议题中惯用的负面话语,并以此衍生出“集中营”“强制劳动”“剥夺言论自由”“侵犯信仰自由”“公开的监狱”等一系列残酷的叙事情节。如美国《纽约时报》称中国政府“sen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uslims into internment camps”(把成百上千的穆斯林送进了集中营),美国《华盛顿邮报》在2021年7月6日报道中甚至把数字夸张到100万,“1 million Uyghurs and other Muslims have been confined to concentration camp(一百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被监禁在集中营中)。英国《卫报》的报道则编造了种种“罪行”:“The denial of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and assembly, and the denial of religious, language, cultural rights”(剥夺言论与集会自由以及剥夺宗教、语

言和文化权利)。美联社甚至宣称“Chinese policies have turned Tibet itself into an open-air prison with restrictions on all aspects of Tibetan life”(中国警察已经把西藏变成一个严格限制藏人生活所有方面的公开的监狱)。

负面话语五：“种族灭绝”(Genocide)

这是西方媒体编造出来的一个极为恶劣的话语叙事,不仅将“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撕裂开来,而且将“民族复兴”与“种族灭绝”捆绑在一起,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颠覆性的破坏力。具体叙事细节还有“大规模关押”“清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美国《华盛顿邮报》在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100周年之际刊发的文章就抛出了这一负面话语叙事:“Beijing is stepping up its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and other minorities in Xinjiang”(北京正在新疆升级其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加拿大《环球邮报》2021年11月12日在对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的报道中也提议拜登使用这一话语叙事:“He could also raise issues such as accusations of genocide against Uyghurs in Xinjiang”(他会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指控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行为)。

研究发现,西方媒体惯用这五个负面话语与叙事逻辑报道中国民族议题,实际上在有意建构一个侵略殖民扩张、同化弱势民族、专制统治压迫、剥夺基本人权、实施种族灭绝、追求世界霸权的负面形象。这种极端负面、扭曲、虚假的话语叙事实际上有两个理论来源:

一是西方“单一民族建国”的“一元一体”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拥有同样的历史、语言、文化、疆域的单一民族才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以此论之,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中国就是汉族国家,中国的疆域就是汉族的疆域;汉族在历史上不断对外殖民扩张,同化其他民族;其他民族具有与汉族不同的疆域、历史、语言、文化,拥有民族独立的权利。在近代历史上,以日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基于这种理论,杜撰出满、蒙古、回、藏等少数民族备受汉族压迫和同化的谬论,以策划扶植“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等伪民族政权,达到分裂中国、侵略殖民的目的。

二是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冷战”思维。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意识”是一种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民族认知,共享着同样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与政治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多元一体”的独特民族国家结构,其核心凝聚力在于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对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衷拥护。而西方国家出于“自由—专制”二元对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用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自然充满敌意和偏见。西方媒体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丑化为“侵略者”“压迫者”“统治者”,完全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共御外侮、翻身解放、脱贫致富、安居乐业的客观事实。

五、中西方关于中华民族主要话语与叙事的比较分析

为探索新时代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对外传播的突破路径,本文进一步对中西方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话语与叙事进行文本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根据话语与叙事的内容特征,中西方话语叙事可分为以宣传思想理念为主的“宣示性话语叙事”、以介绍政策方针为主的“政策性话语叙事”和以舆论斗争为主的“斗争性话语叙事”三种。根据话语及叙事之间的关系特点,

中西方话语叙事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与西方话语直接构成矛盾的“直接回应关系”、与西方话语侧面构成矛盾的“间接回应关系”以及跳出西方话语逻辑进行反驳攻击的“主动反击关系”。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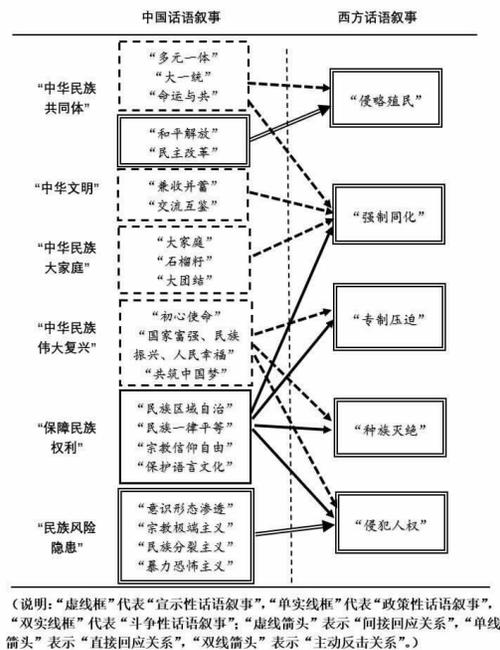


图3 中西方关于中华民族主要话语及叙事的对比分析示意图

第一，中方话语叙事初步具备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特质，而西方话语叙事的包容性较差。从中方“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叙事文本来看，不仅在民族历史、民族权利、民族风险隐患上使用的核心话语和主体叙事，如“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保护语言文化”，乃至“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均与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民族理论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共通共享，而且在民族形成、民族关系、民族复兴等中国特色较为明显的几个方面，所使用的“共同体”“大家庭”“大团结”“石榴籽”“中国梦”“交流互鉴”等话语叙事，也采用了简洁明了、生动形象的表述方式阐释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方便海外受众理解和接受。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已初步具备了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特质。反观西方媒体建构的话语叙事基本是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及民族话语生发而来，对不同政治制度及文明形态的包容性较差，他国受众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中方话语叙事正走向融通中外，而西方话语叙事则愈发自我封闭。

第二，中方话语叙事以立为主、以破为辅，而西方话语叙事则破坏性较强。中方建构的话语与叙事体系涵盖“宣示性话语叙事”“政策性话语叙事”“斗争性话语叙事”三种，涉及议题较广，国际传播以理念宣示为主、政策宣介和舆论斗争为辅，总体上较为正面积极，建设性较强，斗争性较弱。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障民族权利”“防范风险隐患”六大话语叙事中，前四大话语叙事是主体，重在建构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后两大话语是辅助，意在阐释必要的保障政策和斗争举措。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华民族议题上主要运用“斗争性话语叙事”，极少使用“宣示性”和“政策性”的话语叙事，国际传播以主动攻击为主，总体上较为负面消极，破坏性较强，建设性较弱。西方

媒体使用的“侵略殖民”“强制同化”“专制压迫”“种族灭绝”“侵犯人权”等五大主要话语叙事，第一个指向“民族历史”，其余四个都指向“民族权利”问题，主要目的是质疑中华民族共同体合法性、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

第三，中方主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回应西方话语叙事攻击，可以用于主动反击的话语叙事相对较少。在直接回应方面，中方关于“保障民族权利”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一律平等”“宗教信仰自由”“保护语言文化”等话语叙事，可以直接回应西方“强制同化”“专制压迫”“种族灭绝”“侵犯人权”四个方面的指责攻击。在间接回应方面，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的话语叙事“多元一体”“大一统”“命运与共”可以侧面回应“殖民侵略”“强制同化”，关于“中华文明”的话语叙事、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叙事，可以侧面回应“强制同化”，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话语叙事可以侧面回应“专制压迫”“种族灭绝”“侵犯人权”。在主动反击方面，“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话语叙事能够揭露新中国成立前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人民饱受压迫、社会黑暗的残酷现实，确立中国共产党解放少数民族群众、建立民族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反驳西方所谓“侵略殖民”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的话语叙事，能够揭露事情真相，拆穿西方编造的“侵犯人权”的谎言。但总体而言，能够用于反驳西方话语叙事的“斗争性话语”仍旧不够，以至于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叙事体系的反击能力有限。

第四，中西方围绕中华民族展开的话语叙事之争，一定意义上是文明形态与政治制度之争。一方面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明特质与“一元一体”的西方民族文明特质之争。正是兼收并蓄、交流互鉴的中华文明特质，才促成其“大一统”“大团结”“石榴籽”般的中华民族关系以及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历史，形成平等包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也正是西方文明的种族主义意识和文明等级观念，使其在历史上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殖民、种族灭绝恶行，对本国其他族裔则采取“强制同化”“专制压迫”政策，进而催生西方优越、“一元一体”的世界民族秩序。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之争。中国共产党采取“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举措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信仰自由”等保障民族权利的政策，以及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民族梦想，正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而西方国家出于自由主义政治制度，自然以“民主”“自由”“人权”等话语叙事为工具，在非西方国家推行西方意识形态、煽动民族分裂。因此，中西方围绕中华民族展开的话语叙事之争，实质是在文明与政治方面的不同道路的较量，其结果归根到底需要由历史来评判、由实践来决定。

六、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思考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一般原理及传播学叙事理论的梳理，本文认为，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种的“民族意识”，源于民族形成发展的客观历史实践，并由此衍生出特定的民族认知，其内在机制就是特定群体在交流交往的传播实践中实现了民族话语与叙事的建构与共享。民族话语与叙事在建构民族共同体认知、形塑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传播新思路，就是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实践基础上，建构融通中外、破立并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叙事体系，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破除西方国家及媒体制造的刻板印象和负面标签，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思想基

础与共有精神家园。

沿着这一路径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发现,“中华民族”是在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现代民族意识与民族认知。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也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其倡导和传播“多元一体”的民族话语及叙事,符合中国各民族5000年来既各有特色又追求统一的独特历史传统,也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民主联合原则,形塑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民族权利”等话语为中心,创造性地建构起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使得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知更加真实、立体、全面,并且具备了融通中外的国际传播特质和破立并举的国际传播功能。

然而,随着信息全球化加速发展及中西舆论斗争日益激烈,西方国家及其媒体不断炒作我国民族议题,试图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构成严峻风险挑战。经对西方媒体相关报道分析发现,西方媒体建构起包含“侵略殖民”“强制同化”“专制压迫”“种族灭绝”“侵犯人权”等主要话语的叙事体系,杜撰了一个片面、扭曲、虚假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对中西方话语与叙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方话语与叙事体系以“宣示性话语叙事”为主,建设性较强、斗争性较弱,在国际传播中主要充当正面宣介和解释回应的角色;而西方媒体主要使用“斗争性话语叙事”,破坏性较强,在国际传播中常常处于主动发难的态势。归根结底,中西方的民族话语与叙事之争,一定意义上是文明文化之争、制度之争和意识形态的较量,最终只能由社会实践来评判。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对于如何在国际传播中做到破立并举、融通中外,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传播水平,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的传播力。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华民族”逐步建构起了真实、立体、丰满的话语与叙事体系,已总体具备正面宣示、政策宣介与舆论斗争的国际传播特质。因此,快速放大我方话语与叙事的国际传播声量与流量,加紧打破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中的垄断地位、着力提高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形象的曝光度与存在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首先具备的国际传播“硬实力”。

第二,精准运用话语与叙事策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具体可分三种情况:在涉及民族议题的常规对外报道中,以“宣示性话语叙事”为主、“政策性话语叙事”为辅,有助于产生“正面引领、润物无声”的传播效果;在重要民族团结与发展议题的对外报道中,以“政策性话语叙事”为主,“宣示性话语叙事”“斗争性话语叙事”为辅,做到“攻守兼备、有备无患”;而在敏感民族议题的报道中,则要以“斗争性话语叙事”为主、“政策性话语叙事”为辅,力争在舆论斗争中努力实现“针锋相对、攻守互换”。精准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有效性。

第三,完善话语与叙事体系,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舆论斗争的战斗力和韧性。随着中西方舆论斗争愈演愈烈,当前以建设性为主的“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体系难以应对西方媒体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话语与叙事攻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

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① 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的关键,就是要从“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特质与“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出发,针对西方民族话语叙事的缺陷和弱点,全面加强斗争性话语与叙事建设,才能把握话语主导权、打好舆论主动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长城”。

(三) 思考启示

从更深远层面看,本文对于回答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这一重大命题,得出三点启示:

第一,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体系正在迎来时代性、超越性的范式转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特征与“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出发,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斗争实践,建构起一整套“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叙事体系,向着融通中外、破立并举的方向进行具有时代性与超越性的范式转换。这种转换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崇高价值的坚守,也有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创造与丰富实践的创新,更有对西方反华势力抹黑攻击的回应及反制。筑造客观真实、立体丰满、系统全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话语与叙事新范式的重要功能。

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实践是铸牢共同体意识的不竭源泉。马克思主义指出,意识形态虽然具有“认知性”的独特规律,但更离不开“实践性”的客观条件。任何社会意识及其形态,来源于社会实践,最终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不牢固、共同体认知可不可信,归根到底,要看能否真实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实践,能否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精神面貌,能否有力回应国际上反华势力的质疑和挑战。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全新历史进程,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必将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注入蓬勃生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不竭源泉。

第三,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理论和知识创新。一方面,需要加紧打破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中的霸权地位,快速放大我方媒体的国际传播声量,在不同议题上灵活运用不同话语与叙事策略,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曝光度与针对性;另一方面,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特征与“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出发,加强、改进和完善理论话语与叙事体系,使其融通中外、破立并举,这就离不开理论创新。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共同努力,协同创新,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长城”。

〔责任编辑 马 骅〕

^① 本报评论员:《坚持原则 敢于斗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5日。